

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與版權保護並行

黃福來 知識產權署署長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財政司司長在今年2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人工

智能是加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並推出一系列措施全力發展人工智能為關鍵產業。國務院總理李強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出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香港必須在科技發展浪潮中保持競爭力，同時堅定維護健全版權制度。

特区政府於今年2月向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建議修訂《版權條例》，引入特定的文本及數據開採版權豁免(TDM豁免)，正是特区政府在容許版權有人保留權利的大前提下，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締造有利環境的舉措。

持續溝通 釋除疑慮

特區政府的建議獲得事務委員會支持，但我們留意到社會有部分人士(尤其是文創業界)對版權保障表達關注。為釋除疑慮，特区政府積極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繼去年諮詢期間的座談會及論壇後，特区政府在過去數星期亦透過多場交流會，與近70名來自文創產業(包括新聞媒體、出版、電影、廣播及音樂等)的代表深入交流，詳細解釋立法建議並聆聽關注。

立法建議的平衡之道

特区政府高度重視文創產業對香港的貢獻，也深明版權保護對其的重要性。擬議的TDM豁免將訂立更完善的法律框架，保障版權有人權益，同時容許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作文本及數據開採，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讓文創及創科兩大產業互利共贏。

我必須強調，擬議的TDM豁免絕非無條件開放或容許他人任意使用版權作品。法律條文會訂明，如版權有人保留其版權作品的權利，或已制定適用的特許

計劃，供他人合法使用其作品進行文本及數據開採，TDM豁免將不適用。換言之，在版權擁有人已經保留權利的情況下，使用者須取得版權擁有人同意方可進行文本及數據開採。

值得留意的是，《版權條例》現行60多項版權豁免條文中，在絕大部分情況下，版權擁有人意願並不能凌駕豁免的適用性。擬議的TDM豁免是例外，充分體現我們尊重版權擁有人權益。

此外，法律條文會規定使用TDM豁免時必須符合另外3項條件，即合法取用版權作品、不得使用侵權複製品及必須備存和披露版權作品來源的紀錄。

促進商業合作

擬議的TDM豁免與歐盟、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看齊，提供明確的法律框架，鼓勵人工智能開發商與版權擁有人商討授權協議。事實上，國際間有多家媒體機構與人工智能企業已達成或正商議授權協議。隨着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市場對高質量數據的需求亦會增加，從而提升文創作品的價值和版權擁有人議價能力。

實務守則供業界參考

除推進立法工作外，我們亦會參考國際經驗制定實務守則，涵蓋版權擁有人表明保留權利的方式及使用者如何備存和披露版權作品來源的紀錄等，提供具體指引供業界跟從。我們會在過程中與業界緊密溝通，確保守則切實可行。

共同推動平衡發展

特區政府的目標是在促進創新與保護版權之間尋求合適平衡。擬議的TDM豁免正是經過審慎考量、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透過各方努力，我相信香港在人工智能時代不僅能保持競爭優勢，更能推動版權擁有人為其作品增值。

編者按

國務院總理李強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並提出香港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香港在積極建設「八大中心」及打造「三中心一高地」的路上，如何透過創科發展賦能產業轉型升級、開拓新產業增長點是重大課題。本欄目今日起邀來香港創科、經濟及新興產業等界別翹楚，從教育、科技、人才、政策規劃等方面分享真知灼見，啟發社會各界思考，共同助力香港產業轉型升級。

協同教育與人才 促進創科實現突破

香港產業升呢有計



2024年12月，《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發布，為國家的教育發展勾勒出清晰的藍圖，明確了教育強國、人才強國與科技強國三者相輔相成的關係。其中，教育強國是基礎：只有教育強大，才能為國家提供高質量人才，推動社會進步；人才強國是核心：只有人才輩出，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才能為科技強國提供智力支撐；科技強國是目標：《綱要》提出培育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科技發展離不開人才，而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基礎，教育強國培養的人才在科技領域發揮引領作用，推動科技創新，同時科技的進步也會反哺教育，促進教育改革和創新。實現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的目標，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支撐。這一戰略框架同樣為香港的創科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香港若想在創科領域實現突破，必須從教育、人才與科技三個維度入手，協同推進，方能取得長遠發展。

吳宏偉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副校長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生院院長

生源是教育的源頭活水，優質生源更是創科發展的希望所在。香港憑藉其國際化優勢和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在全球教育領域佔據重要地位。

抓生源：培育國際化創科人才的基石

2023年全國兩會舉行期間，筆者撰寫了「建設香港國際教育中心」的提案，旨在推動香港打造涵蓋小學、中學、大學全過程國際化培養體系。這一建議部分已被特区政府採納。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推出一系列「捨人、留人、育人」以及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措施。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可以吸引國際優質生源，培育具有中國心和全球競爭力的國際化人才。香港應進一步拓展國際教育樞紐建設，將資源延伸至中學和小學階段，充分發揮國際化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優質生源，為創科發展築牢根基。

促教育：創科文化建設的關鍵一環

教育是創科發展的基石，而創科文化建設則是教育的核心內容。香港在推動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等傳統要素，更要強調創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因為要培養科技人才，就要讓學童從小激發出對科學的興趣、熏陶科學精神。當前，香港中小學大力推動STEM教育，大學積極增開創科課程並推出創科實習計劃，但科學普及的推廣仍有待拓展至學校以外的社群。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善用科學相關展館推廣全民科普教育」，筆者建議步子應邁大一點，在香港建設一所綜合性、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科技館。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筆者提交了一份《關於建設香港中國綜合性科技館的提案》，建議參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位於北京的中國科技館合作，整合粵港澳大灣區科學館資源優勢，依託香港，輻射灣區，建設一所綜合性科學館。一方面將科技館功能融入創科生態體系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有機結合科學教育的社會服務屬性與促進產業發展的經濟屬性；另一方面用好香港視窗拓展國際網絡，擴大中國科技的國際影響力，向世界親身講好中國科技故事。

引人才：大灣區融合與國際合作的雙引擎

發展經濟與產業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關鍵。香港在經濟發展方面需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深度融合，攜手聚焦高端製造業、科技創新、現代服務業等前沿領域，打造全球競爭力產業集群。通過提供豐富就業機會、優厚創業環境和廣闊職業發展空間，為青年科研人才創造良好條件。其中，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關鍵戰略，正確定位與合力發揮優勢至關重要。廣東擁有製造業的產業基礎和優勢，而香港則在基礎科研、國際人才、金融法律等現代服務業方面具有優勢，兩者結合將加速科研成果落地。下一步的發展方向需要從物理上的互聯互通，更多地轉向制

度層面上的互聯互通，真正實現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優勢互補。

此外，香港還應當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發揮香港優勢，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快形成合力。當前國家大力支持與鼓勵科研國際合作，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卻有待進一步發揮。一方面，內地與港澳科研機構在人才流動、設備共用、資料互通等方面尚未實現深度協同，現行政策存在明顯制度落差。另一方面，對標國際頂尖科研協作範式，我國在創新要素集聚平台建設須更趨成熟，並建立長效穩定的高端對話平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筆者提交了一份《關於打造中國版「戈登會議」、推進科研國際合作的提案》，建議圍繞以香港為會議地址，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重大科學前沿，創辦中國版「戈登會議」，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學術會議體系；同時設立港澳國際學者研究專項基金，擴大「外國學者研究基金項目」資助範圍，支持在港澳開展基礎科研工作外籍優秀科研人員的研究項目。希望以上舉措可以一方面幫助香港吸引國際人才，另一方面推進國家科研國際合作，實現雙贏。

香港的創科發展離不開教育、人才與科技的協同共進。通過抓生源、促教育、引人才，香港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大灣區各城市攜手共進，為國家的科技強國戰略貢獻力量，同時也為自身發展開闢廣闊前景。

以長遠目光布局 在全球化變革中搶佔上風

毛振華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王子君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多國實施新關稅政策，其中對中國總關稅累計高達54%。情理之外，意料之中。這一舉措，被許多人視為又一次「特朗普式的政策衝擊」——激進、情緒化，破壞性極強。特朗普政府的加徵關稅政策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股票、黃金、原油等主要資產價格大幅下行，衝擊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同時，該政策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爭議，多個國家相繼表達批評立場並採取反制措施。中國政府也及時發表《中國政府關於反對美國濫施關稅的立場》聲明，明確表明反對單邊主義與貿易霸凌的原則立場，同時重申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對外開放、支持經濟全球化。該立場主張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廣泛理解與積極回應。

特朗普政府為何推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關稅政策？有觀點將其歸因於特朗普本人偏激且反建制的政治風格，然而，如果將其簡化為個人風格的異動，未免低估了其背後的制度性根源與結構性邏輯。事實上，這並非歷史的偶發偏差，而是美國全球經濟戰略轉向的必然結果。特朗普所主導的關稅戰，不是孤立的政策主張，而是美國長期經濟模式內部矛盾的集中爆發。激進的貿易政策、對全球治理規則的漠視，甚至對傳統盟友的挑釁，不過是使這一過程更迅速地顯形。

主導地位流失 美急於戰略重組

全球化並非市場自發演化的結果，而是美國制度性設計下的全球重構。冷戰後，美國主動推動貿易自由化與資本賬戶開放，通過WTO、IMF、跨國公司擴展與美元體系綁定，將自身嵌入全球產業鏈與金融體系的核心。這套安排使美國得以輸出技術與標準，輸入廉價商品與全球資本，形成一個以美元為樞紐的

「高消費—高赤字—高吸引力」模式，全球化成為其維繫霸權的制度性工具。但這一模式也伴隨結構性失衡的加深。首先，製造業外遷與金融膨脹雖提升了企業利潤，卻加劇了「資本—勞動」之間的分化。中產階層因就業外流而邊緣化，勞動參與率下墜，區域性衰退與收入不平等同步擴大。其次，在金融自由化與美元主導地位的雙重推動下，資本跨境流動加速，金融市場成為增長表面的引擎。但這種增長越來越脫離實體支撐，推動美國從「去工業化」走向「虛擬繁榮」。

2008年金融危機是這一制度邏輯的臨界點：金融主導的繁榮不可持續，生產體系的空心化已難掩蓋。然而，危機後的政策選擇卻仍以維持金融體系穩定為核心，並未觸及重建實體經濟的深層改革，導致系統性脆弱性繼續積累。生產鏈的外遷削弱了國內就業基礎，貨幣政策的寬鬆亦未能有效修復中低收入階層的長期損失。這種制度安排既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延伸，也是其國內裂解的根源：它以全球統攝換取霸權，卻在內部誘發深層次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性矛盾。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快速上升，正在從根本上挑戰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配置。當中國在出口、製造業乃至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美國不再是唯一的「全球化中心」，全球權力結構出現鬆動。這促使美國政策精英重新審視全球化的戰略回報與制度風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與「亞太再平衡」戰略，旨在恢復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特朗普上一任期則通過單邊主義推動關稅壁壘和供應鏈回流，將產業安全置於自由貿易之上；美國前總統拜登進一步技術化這一戰略，借助《晶片法案》和《清潔能源法案》，加大對戰略性行業的補貼與管控，打造更加安全與韌性的產業

鏈。

2025年特朗普關稅升級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經濟戰略長期調整的一個階段性高潮。然而，這場調整的代價也不容忽視。全球價值鏈重構可能帶來通脹壓力、資源錯配與發展摩擦，新一輪保護主義的擴散將重現各國的比較優勢與發展路徑。對美國而言，這是一次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戰略重組；而對全球來說，則意味著傳統全球化的終結。這不僅是某一國政策意志的結果，更是全球經濟制度邏輯自我耗竭的歷史性進程。

規則在變 在窗口期把握戰略先機

在判斷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時，一個常見的誤區，是把「規則的變化」誤讀為「規律的終結」。事實上，支撐全球化演進的根本動力，從來不是某一套制度安排，而是技術進步、資本逐利和市場效率這三股深層力量的相互作用。制度可以調整，規則可以轉向，但只要這三股力量仍在持續運轉，全球化的大勢就不會終止，只會變形重組。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戰與對外投資限制，並非偶然的政策激進，而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扭曲的系統性反應。看似是一種脫鉤，實則是一種披着保護主義外衣的結構性重組。這場重組，並不代表全球化的終結。技術仍在降低跨境交易成本，資本回報差異仍在推動要素跨境流動，資訊擴散也在不斷壓縮比較優勢的生命周期。這些規律，不因任何單一國家的政策選擇而停滯。它們構成了全球化的基礎結構，一如引力之於天體運行。只要規律尚在，潮流終將復歸。

因此，中國面臨的，不是一場孤立的外部衝擊，而是一次全球制度裂變背景下的戰略布局窗口期。這種制度重組不僅會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結構，也會決定未來幾十年產業與技術的主導方向。中國的戰略選擇，應當聚焦於兩個

核心方向：第一、增強制度韌性。通過產業鏈自主可控、政策協調能力和科技投入，提升對外部衝擊的應對力，避免在關鍵節點上被動；第二、贏得結構性時間。主動調整對外開放戰略，以耐心換空間，在下一輪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塑造新的戰略節點，尤其是在綠色轉型、高端製造與數字產業等領域。

全球化沒有終結，它只是換了路徑和節奏。真正的戰略，不是迎頭趕上每一次風口，而是順應深層規律，在看似沉寂中完成關鍵布局。當風暴過去，結構性的機會自然顯現。

以制度優勢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的應對策略，應基於深刻理解全球利益分配機制的變遷，採取理性且前瞻性的多層次戰略布局。宏觀目標是在全球價值鏈重組中提升節點地位。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取決於一國在全球價值鏈、金融網絡與技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已逐步從「世界工廠」轉向成為價值鏈主導者與規則塑造者的高維度角色。

中國應致力於從中低端製造向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以避免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隨着全球生產網絡向「區域化」轉型，中國應加快構建以亞太及周邊新興市場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在這一過程中，區域協作不僅能夠增強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還能在動盪的國際環境中提供更多的戰略靈活性。同時，中國應強化全球規則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在數字經濟、綠色貿易和技術標準等領域，推動全球新制度的設計和實施。通過在這些領域取得主導地位，中國能夠為全球治理體系的結構貢獻中國智慧，並在全球化未來的框架內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就內部韌性而言，提升中國內部經濟的自治性和戰略迴旋空間，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並保障全球戰略的前提。技術自主、要素安全 and 內需驅動將是提升中國戰略韌性的關鍵。

首先，在核心技術、原材料和能源安全等領域，加速推動國產化替代與多元

化布局，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過度依賴。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的持續提升將是中國未來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其次，中國應優化國內市場迴圈，通過培育中高端消費群體、推動內需升級來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在金融獨立性方面，進一步加強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減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推動金融體系的自主性提升。

外部戰略方面，以全球南方為戰略支點構建新型全球網絡。面對複雜的全球戰略環境，中國應重點布局全球南方，特別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轉移，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推動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的廣泛應用，尤其是在中東和非洲等新興市場，將是打破美元資本壟斷的關鍵。

香港特區在國家戰略布局中也有重要的角色定位。在全球供應鏈與資本流動重新配置的背景下，國際金融與中國產業資本輸出服務將備受關注，香港面臨從「美元體系中介平台」向「人民幣區域金融中樞」的轉型。這一轉型不僅關乎香港特區的經濟未來，也將影響中國整體戰略布局的順利推進。

在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新的全球化格局中，香港特區可憑藉「一國兩制」賦予的制度靈活性，在法律體系、經濟自由度、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以及人才積累等方面展現獨特優勢，為全球化的高質量推進提供關鍵支撐。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隨着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持續發酵，全球貿易體系因關稅壁壘而趨於收縮，多數國家紛紛將吸引外資發展中國製造業作為應對之策。此舉與中國推動資本輸出、企業加快「出海」的戰略方向不謀而合。在這一全球產業與資本格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香港特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有望成為本地、內地企業「出海」的關鍵基地，在融資、支持、仲裁、法律支持、標準認證、貿易交割、人才流動等環節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中介與流轉作用，從而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